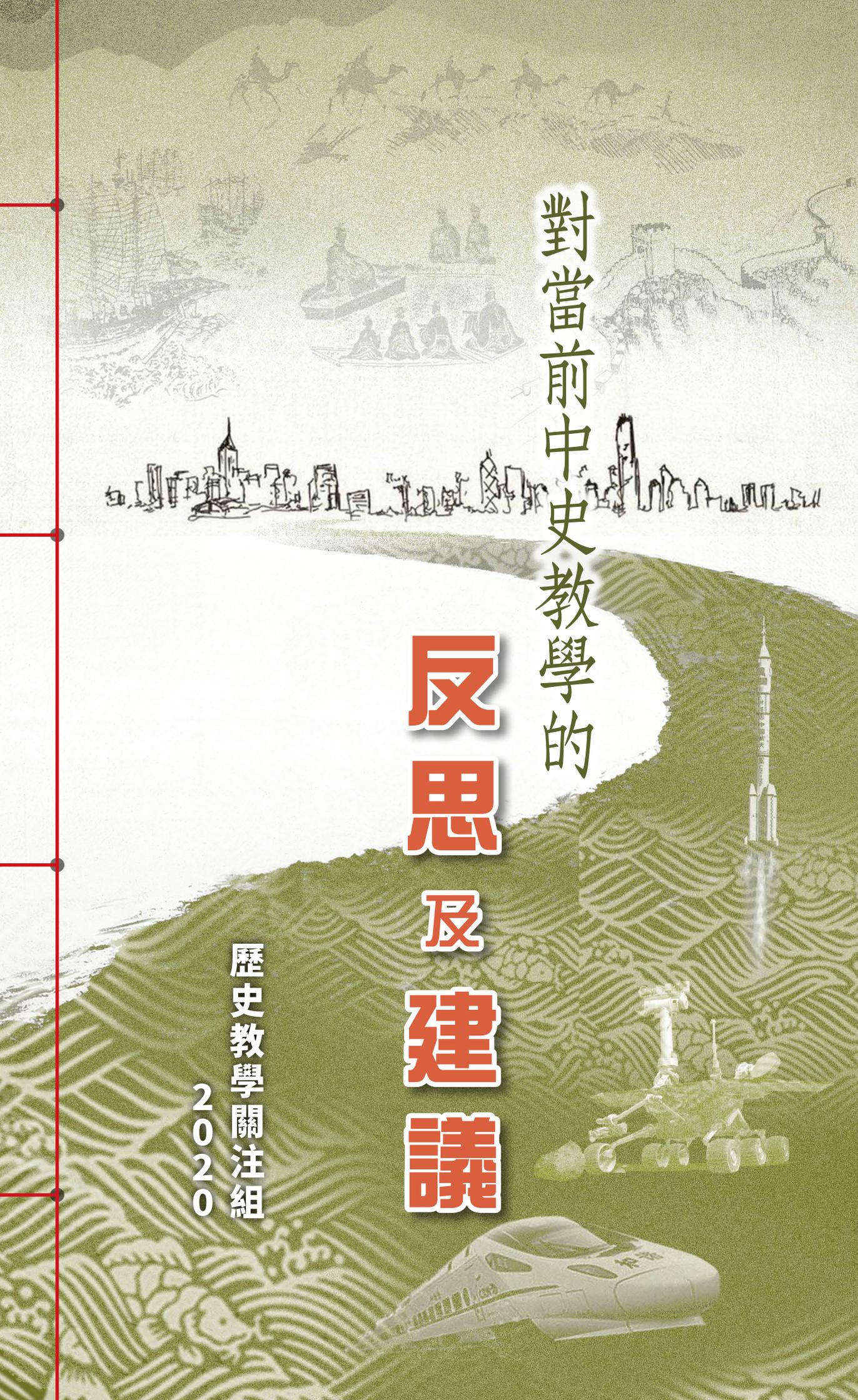


對當前中史教學的

反思 及 建議

歷史教學關注組

2020



重溫教育初心
反思教學實踐

庚子之秋 鄧正鴻



序言

這本小冊子包含兩個部份：正文是由「歷史教學關注組」編寫成的，評論當前的中史及歷史教學及提出建議。附錄的四篇文章從不同角度就當前的中史和歷史教學出現的問題提出意見。在正文當中，還加插了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的精闢論述，以金句形式表達。

我們出版這本小冊子，旨在讓前線教師反思現時的教學實踐，以優化課堂的教學工作，同時亦希望教育和考評當局吸取教訓，針對正文及附錄文章所指出的流弊，就中史科的課程、教學法及考試評估作出大幅度的改善。

我們認為，中史科和歷史科從來不單只是工具性學科，只強調知識和技能。誠如史學大師錢穆先生所言，我們對待自己的歷史必須存在「溫情與敬意」。中國歷史的教育有培育民族感情及身份認同的重大意義存在，這點必須是所有課程、教學法及考評的出發點。也是師資培訓和發展的重點。

「歷史教學關注組」由一群在本地大學主修歷史並孜孜不倦，化雨之餘更嚮往歷史學問，關心青少年價值教育的人士組成，有鑒於近期中史及歷史教學與考評常出現的種種爭議，於是對中史科課程及主流教科書作出研究，並且吸納多位現任資深中史科及歷史科老師的意見，編寫了這篇文章。教育評議會及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樂意向全港中學中史科、歷史科老師，小學常識科老師，大學師資訓練機構，香港教育局及考評局相關部門推薦這本小冊子。由於編寫時間較為倉猝，當中有缺漏的地方，盼望各位多加指正。

重溫教學初心，反思教學內容與方法，優化自身的教學實踐。這就是我們出版這本小冊子的原委。

教育評議會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2020年10月

反思
教學實踐
鳴謝

無名氏贊助出版經費

鄧兆鴻校長惠賜提辭墨寶

多名資深中史科及歷史科老師提供寶貴意見

以下摘文得原作者答允轉載：

一群具多年高中評卷經驗的歷史科老師

劉鴻輝老師

李偉雄老師

何漢權校長

對當前中史教學的反思及建議

歷史教學關注組

前言

香港回歸初期，特區政府在其施政報告中公佈要檢討當時的學校課程，曾要求香港學校課程有更多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知識，並要促進學生身心均衡發展。千禧年後，香港遂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教育改革，可惜在落實時其重點卻主要集中在學制及課程內容兩大項，對於一些核心問題如歷史文化意識教育、語文教育

和社會及人生價值等問題則似沒有長遠或全盤的反省和籌劃。過去一年來本港學校教育發生了不少令人困惑不安的事情，諸如中學生捲入了政治爭議，以至違規政治的活動，年青學子對中國認識的偏頗誤讀，老師及擬題考評員設定具爭議性的練習及試題，這一切在在均顯示出我們現時學校教育的內容委實出了不少問題，若再不對症下藥，加以改善，恐怕只會使特區教育每況愈下。

唐代劉知幾：

史才須有三長……
三才，謂才也、學也、識也。

清代章學誠：

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所謂著書者之心術也。

教育強調個人主義、欠缺培養家國情意

千禧年啟始香港進行的學校教育改革，其本意是欲矯正殖民地的精英政策，學生讀書只為考試，藉以向上流動與及考試為博取優異成績而變成死背書的考試機器，失去個人多元發展的可能性。廿年過去，眼下看到的教育界及連串青少年的問題，使人懷

疑教改方向有矯枉過正之嫌，距離培養出健全、完善、平衡、獨立、知禮義廉恥素質的青年人之理想上相去甚遠！教改的原意是要令學生學會學習及掌握獨立思考能力，可惜在鬆綁之後，我們學校的課程連一些至關緊要的基礎教學內容也抹殺掉，改而引進了一些所謂「與時並進」未經驗證的通識化內容，使一般的學生因沒能掌握基礎知識而急切著去展示自己的獨特意見，在概念混淆下，往往變得無所適從，常時陷於似是而非狀態，頓然不分西東。

經過這年來的風風雨雨，我們必須強調教育最基本的目標，最低限度必須使學生達致明辨是非及對自己身處的環境及家國的文化歷史有所認識。若學校教育不重視中國歷史，我們的中學生又如何建立對自己祖國的關懷及敬意？歷史教育是全面教育重要的一環工作。香港社會走到現在這關頭，委實需要各方更大的決心才能解決當前教育界面對的巨大挑戰。

錢穆：

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以及〉必附隨著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認識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性

尋根問源，欲知道自己是誰、自己的父母祖先來自那方、又或是香港此城的過去均是人們好奇心和真性情的自然表現。「現在」的香港是來自「近代」的中國，對於生長在香港的同學，這個近代中國的世界究竟是怎麼樣？有那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影響了我們今天的生活？這些都是同學特別值得反思的大問題。對於近代中國歷史的認知，相信所有高三同學均會倚重中史教科書來獲取這段時期歷史的資料。除此之外，他們也會受到來自不同媒體、閒談及報章的影響。

依照現時新高中課程中史課程改革及探究式教學模式的安排，中國歷史科是初中三年「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的必修科，它讓所有中一、中二及中三學生在此三年內學習認識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歷史，而中三學生會集中了解滿清入關至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及至香港回歸這三百多年的歷史。據坊間調查，涵蓋初中三年「近代中國」的教科書由主要五個不同出版商編撰及發行，再送交教育局的課程發展處審批。不過，考慮及商業營運原則，這些教科書基本上是任由不同辦學團體自由選擇採用，對於全港數百中學校，教育局在學校採購方面並無強制性及劃一性的要求措施。而落實到學校層面，教師教學往往因課時倉促有限（平均每週不足一個半小時）及考試要求而

不全然依書教授、近年有些老師還會另行各自編寫更簡單的補充筆記給予學生速成學習。這些教學材料無疑是有著影響學生認清史實及建立正確的歷史觀點和人文視野的重要媒介平台。本著教育工作者的良知，我們對現存初中教科書在「近代中國」若干歷史事件上的描述和紀錄作出了一些的觀察和反思，並欲與同工們分享如下。

陳寅恪：

自鴉片戰爭後，
「先進的中國人」
一直在「一方面吸
收輸入外來之學
說，一方面不忘本
來民族之地位」。

（一）首先，在內容及史料文字編排方面，儘管「近代中國」的歷史和香港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學校的中史科及其教科書的安排並沒有隨著「一國兩制」的新政治社會環境而作出相應的改變。97 回歸之後，新高中課程內中英數及新增的通識科成為中學畢業必修必考的核心科目，在此消彼長的有限選擇下，中史科進一步被忽視。故此，絕大部份香港的青少年學子對五千年華夏文化與及「近代中國」歷史的學習，多停留於中三14, 15歲的少年期。每年全港僅有五千名適齡的高中同學才有機會在校選修中史。回

看初中三同學賴以認識國家及其發展的在校主要媒介—教科書的內容，其中一具規模的資深出版商的有關書本長達300頁，涵蓋政治史範圍的指定學習9大議題及課次，圖文並茂包括不少插圖及「研習題目」。儘管有課後的「網上電子資料」及「好書推介」，有文字的「課文敘述」往往只佔全書約一半的篇幅，在解說任何一件歷史事件時輕重不成比例，遑論綜述該事件的全貌，連交待歷史事件必然錯綜複雜的發展過程也缺乏。以「近代中國史」的序幕事件，及和港人歷史命運息息相關的鴉片戰爭為例，有關的篇幅佔以上教材大約只有十二頁，其中反思答問的練習佔三頁，圖片近三十幅，敘述文字的簡略可想而知。在繁忙的課業壓力下，展現在這些初中三同學們眼前的近代中國的啟始，往往如飛花亂動，一片片碎化了的斷幅故事。

(二) 其次為了配合千禧年後引進的課程改革及「探究式學習模式」的教學取向，同學在初始學習中國歷史時，也被鼓勵像「陪審員」和「法官」般去審視歷史事實。以鴉片戰爭這重要的事件為例，同學在「學習起跑點」上便要面對「禁煙的抉擇：弛禁與嚴禁」的不同意見，並且在還沒有掌握到此一歷史事件的基本史實之前便得作出比較及分析從而判斷哪一歷史人物哪一派系的禁煙主張較高明。如何組織教材及敘述事情是詳是簡是先是後是歷史研究的大學問，對於教導初學歷史這門學科的老師則尤其首要堅持「存真」和「準確」。現時這樣的一個「探究式」的教學策略，應用在學習歷史科上是十分危險的安排。再以「鴉片戰爭」為例，鴉片貿易之勃興和走私猖厥到了道光年間已經十分嚴峻，鴉片戰爭爆發前，因為鴉片這種會毒害國民的商品貿易「出超」而大量對外流失了白銀，民間吸食鴉



傅斯年：

「上窮碧落下黃泉，
動手動腳找材料。」

「史學的本業在
“純就史料以探史
實”，通過“客觀的
處理”材料以尋求事
實，發現問題……」



反思
教學實踐

片成癮，身心受損，甚至家破人亡，禍延全國。清廷在禁煙與否這議題上實已傾向決心把之消滅，禁煙的抉擇已不是此戰發生的關鍵因素。只為了引起學習興趣，而於學生還沒有充份掌握史實前，便引此議題要求同學討論，就是輕重不分，浪費有限教材篇幅。

探究式學習的教學策略是基於建構主義的一種教育方法，其基本精神是讓學生成為知識的主動建構者。儘管他能提高學生參與度及允許老師把個人經驗轉化給予學生，但其缺點亦是至為明顯，譬如把學生訓練成不接受規範，挑戰客觀事實，及凡事必疑的地步。近年來，不少教育者及研究已相繼發現這方法並不是一劑萬能藥，在文學科目的實施過程中，老師既費時作課前準備亦不能有效創建課程，而且在組織學生進行高階認知活動時，會遇到更多的學生犯錯的困難。

(三) 反思過去一年社會發生的種種問題，使我們相信相當部分的時下香港年青人，看中國是負面的，皆因他們在校所接受的是一套中華民族的屈辱史。綜觀中史教科書背後傳遞的觀點似乎都在強調著西方文明自外而來，引發近代中國的各種轉變，無論是戰敗求和、大清衰亡或近代中國的混亂，這都是因為中國和世界在相遇時，沒有作出有效回應！閱畢相關課題的教科書，使人感到鴉片戰爭，自強運動必然失敗，清朝不能不亡，皆因皇權獨專、官吏貪污無知、人民愚蠢落後、有識之士高傲無理。以鴉片戰爭的背景及爆發原因的課文敘述為例，作者多從外商角度描述清廷對外的貿易態度及英國的鴉片貿易的重要性，對於為何清廷會於道光中葉對外有如此決絕及不友善的態度，英人的傲慢貪

婪，持強凌弱及侵略野心卻輕描淡寫。以自強運動為另一例以証當前教科書的負面性，歷來史家對此段歷史大致有三種不同記錄的名稱，代表著三類不同評鑑含意。當時官方及學者的普遍說法多稱之為「自強運動」，就運動的目的而言，這是近代中國邁向現代化的第一階段，是經歷了鴉片戰爭的失敗後，朝野有所覺醒而思以富國強兵之術及「自強」之道。可惜，我們的教科書對此運動多集中看其手段，負面批評其流於器物層面遠多於肯定。對於自強運動的中堅領導人如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及張之洞等於此時期的功業，編寫教材的作者似並沒有給予他們合理的地位，往往以今衡古，要求上述的歷史人物突破其身處時代的局限，承擔「洋務運動失敗」的責任，認為他們「識見不高」，「未能作全面的改革」。教科書對上述歷史人物著墨無多，但卻以所謂的「國際視野」詳細表列出事務派官員郭嵩壽被委派出為駐英國公使的感言，認為當時「歐洲各國政教風俗後來居上……外國看待中國，就如古代中國看待夷狄」，引導學員作價值反思，進而批評當時的中國臣民「欠缺國際視野」。再者，教科書還建議我們的中三同學有「歷史研習技能」，從自學吸取不同的史學觀點。這真是把初中生視作大學本科生程度了！這種教學取向，實在頗有商榷之餘地！

當我們的中三同學只略掌握一件歷史事件的皮毛點滴時，編寫教材者卻著眼鼓勵他們用懷疑的眼光去批判某些議題；並未鼓勵學生以國人學史的第一身角度，而用抽離的態度去分析中國近百多年的轉變，比較傳統的中國社會跟西方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的英美國家的分別，同學們自然被引導往看到中華民族的「落後」、「反抗」、「排他」及「固執」的一面，而忽



胡適：

「輸入學理，研究問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學實踐

略了這處於過渡時代的古老東方文明也有其主動建設、創意維新的一方。在一種強調「由外向內」看近代中國問題的史觀及現存教科書的敘事模式主導下，影響晚清發展非常重要的人物如李鴻章及康有為等均沒有得到如實及正面的描述。倘若我們也能「由內向外」及「內外兼看」的去了解 150 多年前自強運動的這代人所處於的生存環境時，同學們便會認識到他們的不容易，以及發現到他們其實是近代中國很超前突出的，從傳統走過來的時代引領者。

（四）最後，我們亦觀察到現存的初中中史教科書太過強調史評而忽略史實的認知。編輯們很多時強調學生應使用「跨學科的態度去評論、分析及重構歷史面貌」，以至忽略了史實的掌握。以「英法聯軍之役」此一課題為其中一例。作者於此章節啟始時即引用「亞羅號事件」中方「懷疑」英商「走私」而「扯下英旗」的衝突作「學習起跑點」，意欲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殊不知此歷史事件只是在此戰役發生的過程中的極小插曲。英法聯軍之役的發生原因錯綜複雜，自始至終主戰者均是英方，目的是欲進一步修改通商條件及擴大其在華權益。研習歷史的學者會告訴我們，必須要堅守的基本準則是「不可基於歪曲不真的史實與及在沒有認清一件歷史事件的背景及來龍去脈下對其作出評價」。但學員甫接觸此一歷史事件時，即被要求扮演國際法庭法官對此役的發生作出分析及判斷「中國還是英國會勝訴」，「戰爭是否解決問題的方法」，與及就此小插曲的爭端去發表意見。

再細看另一「思維訓練」及「史料分析」的例子。作者用了幾乎一整頁的篇幅提供英法聯軍為何「焚燬圓明園」的理據。資料一顯示英法意見不一致。法國認為「應燒掉紫禁城遠勝毀掉皇

帝一人的庭園」。資料二則提供英軍欲懲罰「自高自大」的清官及促使中國人從「皇帝至高無上的荒謬信仰中夢醒過來。」學員最後被引導徹底理解英法對此事的分析，綜合毀園的各種目的，與及分析該等目的達成與否。至於圓明園毀滅大量珍貴文物被搶掠對中國的羞辱及對世界文物史上的桎梏就只有一句簡單的說話描述。若作者也能引導同學從中國人的角度去看「火燒圓明園」這件慘痛的歷史事件，相信同學練習的題目會很有所不同。運用史料達到重現歷史真實以外的目的，與及對歷史事件及人物作出有意義的評價，相信對初中同學研習歷史甚具挑戰性！在此一基礎階段，與其在流沙上蓋樓，我們真切祈望老師在教導中國歷史這科目時都能以認清史實為起步點，較看重固定史實及客觀資料的傳授。給我們的歷史一個較完全和正向的記錄，才能促使我們的年青人對自己民族和國家以往的苦難，奮鬥，和變遷多存一點同情、理解、愛戴及敬意。

總結和建議

教導中國近代史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總的而言，我們現存的初中中史教科書在不同程度上明顯有如下四項偏頗的特點，其所傳遞的歷史意識一直影響著時下年青港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中國人之身份認同，實有檢討的必要。

(一) 課程內容及史料編排主副不分，違反了「紀事本末體」的「重要的多寫不重要的少寫」的取材準則，致若干課題以偏概全。

梁啟超：

史評須「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不容以己意絲豪增減古人之妍醜。」

「史學既是科學亦是藝術。史家之能事是必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二) 教學策略受西方教育概念「探究式學習」支配，令教材組織呈零散的觀感，取材著眼於引起學習的興趣，殊不知此策略並不全然適合於敘述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漠視了史學的課授獨特性，不能作為一純考評的學科看待。

(三) 編撰者的價值取向存有懷疑主義和相對論的主觀，認為借用不同學科的方法及世界性的觀點便是客觀和開放，對若干課題的解釋及敘述局限於外在因素的觀點，忽略了清中葉後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發展變化，亦蘊藏著不少翻天覆地的內在動因。

(四) 濫用史評而忽略史實認知的學習，只憑歷史皮毛便錯誤引導學員在缺乏邏輯及證據作基礎下，對歷史事件及人物作出批評。歷史致知、重構歷史面貌、歷史解釋，不論在任何層次，亦應是史學研究者份內之事。史事重建是深奧的課題，對初學習史者而言，在起點上便催促他們妄下判斷，陷其於不義，實是十分危險的做法。

我們的建議

顧頡剛：

「學者若真想改革社會，就應當去努力求學。」

避免香港社會走上無窮後退的絕路，從今而後，我們的歷史教育必須以改善現行教學教材內容為革新的大方向。期盼中史及歷史科老師們以上述偏頗的情況為戒，做一個專業的史學老師，嚴守「載道明義，傳情說理」的角色，努力鑽研中國歷史的傳統，「如實照說」，在既有客觀存在的材料許可範圍內，盡顯過去歷史真象，把時間多投入講解有趣而生動的歷史人物和故事，探索有意思的問題之餘，少談主義和理

論。學史者須能鑑，決不能數典忘祖，要對國家民族有正向的價值觀，對國史有溫情及敬意。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已是鐵一般的不可逆轉的事實，當局應該對應這一根本性變化而作出教化方向的新指引。以國家主人翁的身份教習中國歷史。認識中華數千年文明歷史的博大而感到與有榮焉；認識中國近代現代歷史的國家被侵略、民族被壓迫和人民被剝削而感受到悲慘和憤慨。對晚清以來眾多仁人志士的變革維新自強、救亡圖存而進行艱苦探索和頑強奮鬥的歷程、經驗和犧牲精神，感到激勵和自信。

確立了正確的教化方向新指引，可讓學生們學有所識，教師們教有所依。配合此大前提下，當局應該重新訂定中史教學課程大綱。使教材編撰和作者及出版社有所規範，當局審批教材也可有所依據。各校內校外公開考試，出題考評均可按課程大綱出題測考到學員所學所識。

在課堂外，當局亦應在歷史館或設立專題香港回歸博物館，對中國近代史、香港被割讓及至回歸的歷史背景和過程加以細緻介紹，與課堂歷史相互配合下，益求精，香港才能走出歷史遺留給此城市的困局！

自信地在一國兩制的新起點上，以中國人的身份，自覺地迎接和承擔起時代賦予我們在廿一世紀新時代的使命，學習好和為世界建設好我們的香港和中國，切實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項建設事業全面推動前進。

參考資料

-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孟氏教育基金會出版，香港，1961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附補篇》商務，台灣，1966（初版發行1922）
張馨保：《林欽差與鴉片戰爭》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4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上冊），1988（下冊）
羅志田：《中國的近代：大國的歷史轉身》香港三聯，2018
坊間各主要出版社初中中國歷史教科書

反思
教學實踐

歷史教育的靈魂是人文價值 絕非文字邏輯

一群具多年高中評卷經驗的歷史科老師

近日，關於文憑試歷史科試題的存廢，爭議不斷。有人甚至提出司法覆核，控告考評局。縱然司法覆核的控告敗訴而回，但仍有個別人士／團體提出，該題歷史題目內容屬課程主題範圍（近代中日關係）以內，提問形式（利大於弊）非常普遍，題目根本沒有問題，不宜取消。

這確實引發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歷史科，作為人文學科之一，其考評目的／擬題標準究竟是什麼？

是否舉凡題目在課程範圍以內，還有提問方式能夠訓練考生文字邏輯技巧，就是「可考」的題目？

斷然不是。歷史科的學科要求，是否要呈現歷史科珍視的價值觀念？

再以近日具爭議性的文憑試考題為例，依據評卷參考，考生須兼論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及「弊」才能獲得第三級的高分。換言之，按評卷參考，若考生只答「弊」而不闡述「利」是不可能取得第三級的分數，而只能取得較低分數。這樣的要求反映了該題目要求考生強行在一段以日本侵略中國為主軸的歷史背景中找一些利處，以平衡弊處，以提供「均衡」答案。這是否變相鼓勵考生不論面對任何議題，也可以用文字表達技巧強詞說「利」，隨意反覆顛倒是非觀念？

眾所週知，日本侵華是鐵一般的事實，不只傷害民族情感，更有違普世價值。我們學習歷史，自小至大已很清楚「以史為鑑」的重要，不要重蹈覆轍，重犯人類過往帶來沉痛代價的錯誤。無論在哪地方，歷史教育的人文價值應該不會有所分別。

故此，我們沒有可能「魚目混珠」，將「訓練一般文字邏輯」的重要性凌駕在「人文精神」及「正面價值觀」之上，摧毀歷史科的靈魂。事實上，歷史上的「大壞人」，正正是以詭辯來掩飾其惡行。二次大戰期間的德國及日本，以「優等民族拯救世界」美化其侵略行為，認為侵略他國是「利大於弊」，為全世界人民帶來莫大痛苦，害己害人。

由此可見，如果評卷標準是「強迫」「誘使」學生一定要回答日本侵華的「利」，才能得分，豈不鼓勵學生誤以為歷史科最重要的價值是「搬弄文字」說理，無須顧及是非觀念和歷史事實？長此下去，所有我們現實世界所否定的惡行，豈不也可以藉文字技巧扭曲成「利大於弊」？

另一個重要關注點，與題目所引用的資料有關。依據「評卷參考」，學生須引用資料，進而得分。可惜，評卷參考的設定偏離史實，要求考生強行在被扭曲原意的資料中找出「利」處。

多位歷史學者已指出，題目所引用的資料以偏概全，經刪剪後扭曲原意，讓考生誤以為當時日本在教育及經濟層面，對中國曾作出貢獻。評卷參考無視資料 C 日本欲借教育滲透中國的圖謀，同樣地，評卷參考亦指考生可以從資料 D 中解讀出「日本為中國帶來經濟支持」這一項日本對中國的利處，無視了日本欲借資料 D 中的交易侵吞漢冶萍公司。事實上，正正相反，題目所引用的資料反而證明瞭日本當時如何剝削中國。

無可否認，考試題目所引用的資料有一定的篇幅限制，只能夠呈現事實的一部份。不過，我們絕對不能接受考試所引用的資料會扭曲原意，指鹿為馬。尤其是，歷史科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是尊重「事實」。擬題標準不會簡單至「只要屬課程主題範圍」就過關。要知道，歷史科涵蓋的事、地、人範圍甚廣，我們不可以含糊其詞，將專業議題標準降低至「接受違背事實片面資訊」，只要資料表面上屬某段歷史時空範疇已可。

總括而言，正如官司判詞清楚指出，此考試題目已經過考評局專業和深入地討論為不可取，故題目取消自是合理。■

（註：本文原刊於 2020 年 8 月 6 日星島日報）

教育敗於「輕知重行」

劉鴻輝（小學老師）

近月各界紛紛指出教育界的諸多不是，然而鮮有就教學理念和流程發端，本文試指出過早在中小學推行高階思維，乏略傳授知識的弊病。

教改理念源於「輕知重行」

教育界由制定課程，以致具體施教，通常離不開「知情意行」這套流程：即學習客觀知識；生起主觀情感；建構意念；作出相應行動。如以教授「環境污染」為例：知：學生認識環境污染嚴重；情：學生對環境被破壞感到不忍；意：學生意識到要環保；行：學生為環保作具體行動。一般把「知」視為基礎認知層面；「情」、「意」偏向感性，有時會一同理解；「行」屬於高階，牽涉到反思過去、評價利弊、思考未來。

教改的重點是啟發學生，激活他們的創意，從而培養適合新時代發展的良好公民。設計時，建基於推想未來大家透過網絡輕易獲得知識，知識貶值，於是在有限課時下，側重培養學生各項「能力」，而刻意少談知識。故此，現今課堂要求老師引導學生尋找知識，單向教授被視為劣質教學。

中小學大力推廣的 STEM、反轉教室等教學法、活動，全是以此為基礎。各科考試題目的比重，亦以考問分析、評價、論述的「高階思維」題目佔比較多。乍聽之下，整套理論很合理，可惜前設有極大謬誤，令學生陷入「思而不學則殆」的困境。

「高階思維」太「離地」

未來資訊爆炸是不爭事實，但在基礎教育層面（小學至初中），不代表可以跳過傳授知識，大談啟發。事實是更應打穩基礎知識，令學生在資訊洪流中明辨是非。

孔子有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大意是不要對中等水平以下的人談形而上的東西，他們難以理解太抽象的事物，應直接教他們怎樣實踐。這話雖然難聽，但「貼地」，符合實際操作。

必須承認中等或以下水平的人才是大多數。據教育局數據，2013/14 至 17/18 年度，入讀公營主流學校的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人數由 33830 躍升至 45360，升幅 34%。2017/18 年度取錄超過 50 名或以上這類學生的中、小學，分別有 44% 和 50%。趨勢顯示這類學生數目越來越多，且不再只集中在低組別學校。可知，在這類學校推行高階思維的難度之高，成效之低。

有人會說：「推行高階思維時，學校視乎校情作調節便行了！」撇除有特殊需要學生，就一般學生而言，課時、精力是固定的，「餅」就只有一個，顧此就會失彼。學校花了時、力作高階教學，意味着學生要自行補回基礎知識，動機強的學生也許能辦到，但動機低下的學生才是主流。況且，精英往往又要兼顧不少課外活動，如能搜尋一下網絡資訊，信手拈來已是不錯了，還奢求他們分辨真偽、貫通各科知識，無疑不設實際。更何況，大家最終都要面對同一個公開試，所謂「校本」，不過枉然！

知行失衡 游談無根

舉一些小學施教 STEM 的例子，再作說明：在初小要求學生做實驗，讓學生養成發現、探求的科學精神。又如：要小三、小四學生記錄更換四驅車不同零件後的車速，以認識變量對機械運作的影響。這樣教授高階思維，在中小學各科俯拾皆是，箇中揠苗助長的弊端顯而易見。故教師經常抱怨：「課程要求日益上移；學生水平日益下移。」校方也不是意識不到問題，卻歸咎於家長之間會攀比，令學校之間不得不攀比。實情是由政策至家、校，每一環都放錯重點。

總結，依「知情意行」的流程，越低班，前者佔比應該越重，否則所謂的分析、評論只是「游談無根」。文憑試歷史科那道「1900-45 年日本對中國利多於弊」的題目，有近四成考生答「利」，正是知、行失衡的寫照。甚至，社會動亂的徵結，也與此脫不了關係。通識科只是「輕知重行」的體現，各界應認清核心問題來加以批評。■

（註：本文原刊於 2020 年 7 月 13 日星島日報）

歷史教育尤重史德

李偉雄（中學老師）

一名小學教師講述有關鴉片戰爭的歷史時，竟稱英國「為消滅鴉片而發起戰爭」，指戰爭原因「就是由於英國發現中國當時很多人吸煙，吸食煙草，這個問題相當嚴重，所以他們為了消滅這些叫做『鴉片』的物品，就發動了這場戰爭。」有關內容明顯顛倒是非，其後校方發現問題十分嚴重，重新上載經修改後的片段。

唐代劉知幾於《史通》中提出史學家應具史才、史學與史識。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三長說」之外，又加上了一個「史德」。其實，這四項對史學家的要求，亦應可作為對每位教授國史者的要求。本文嘗試由史學專業的角度來評論這次虛構歷史事件，這位涉事的老師在這次震驚社會的事件中反映出四大教史弊病——無史才、無史學、無史識、無史德。

作為一個教授國史的工作者要善於用文字來敘述及論證史實，及鑒定史事真偽。能符合此要求者，便可稱得上是有「史才」之人。而涉事小學這位常識科老師向我們示範，如何用不正確的言詞，不鑒定史事真偽，胡亂虛構有關鴉片戰爭的歷史。事件反映出他全無「史才」，實在令人對他的學歷產生疑問，為何如此「無才」之人竟能當起老師。

此外，教授國史工作者應該要對古今歷史資料知識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可稱此為具備「史學」的能力。史學的面很廣，史學工作者既要有中外歷史知識的雄厚基礎，又要在專門從事的專業方面有深厚的造詣。即所謂「博」，應具備廣博的知識基礎。有關史學各門的基本知識，均應有所涉及和了解。這位小學老師在講學片段中，完全暴露出他以政治灌輸為「目的」，顛倒歷史為「手段」，對鴉片戰爭胡亂講解，用不學無術來形容他這次的教學內容，實不為過。

「史識」就是個人對歷史知識的識見，以科學的史觀作指導，來分析大量可靠史實，然後得出「信而有徵」的結論。教授國史工作者不能「以論代史」，而要「論從史出」。「史學三才」中以「史識」為最難，但也最重要，因為有才無識或有學無識，都不足以成為優秀的國史教育工作者。

這位老師在這次教學過程中，將鴉片戰爭中的「侵略者」，講成為「拯救者」。言下之意，好像這場「不義之戰」，異化成為了「正義之戰」。

這份識見之差劣，實在嚇人。他的教學根本就是犯了「以論代史」的嚴重毛病。他虛構出來的鴉片戰爭，只是用來支持他的論點——英國為拯救中國而發動鴉片戰爭。

最後，「史德」，主要指教國史者的品德（「心術」），也即是指追求歷史真實的正直品德。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應必備的品德，就是要忠實於歷史，實事求是，不作偽史學。這點其實最可貴。事件中這位老師，將鴉片戰爭作出如此荒謬的演繹，英國為消滅中國的「鴉片」，就發動了鴉片戰爭。藏於這個觀點背後的政治動機——歌頌英國，呼之欲出。如今次事件沒有被披露，一班小學生如果長時間被這種觀點所誤導，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可見，教授這節有關鴉片戰爭的老師，實在是一位「四無」老師，實在愧為人師！問題是，香港還有多少像這樣篡改歷史的教師？■

（註：本文原刊於2020年5月6日大公報，文題有所修改）

「根」的教育在香港實施的探索

何漢權

特區回歸已踏入 23 年，一國兩制在實踐中，說易難行，英國人殖民地管治超過個半世紀，由此栽種的管理經驗、法治制度，以及政治、社會、文化、教育全覆蓋。回歸後，兩制奔馳，一國墮後，國民身份認同愈感乏力，加上近年中美矛盾衝突的恆常化，香港要左顧右盼，向心一個中國更遇到重重關卡的難阻。2003 年，香港特區政府要進行 23 條的國家安全立法，引發首度七一大遊行反對立法，響起對一國質疑的第一炮，隨後，中港關係開始緊張，香港亂象日益嚴峻，原因是千條萬條，但庸諱言，學校全線教育，連大、中、小以至幼稚園的教育確實出現問題，問題的焦點，是在課程上，師資培訓上，乃至學校的管理階層上，都未有認真地、全面地認識「根」的教育的重要。「根」者，國史、國學、國情三合一的教育之謂，「三國」的教育也可籠統稱做國民教育，這是錢穆先生所說的，凡一國之民，當對一國之歷史要有初步的認識和瞭解，一國之民，對本國的歷史發展當有溫情敬意，當有同情諒解。¹ 筆者執信，在香港推動國民教育之根本，實源於國史教育（香港向稱中國歷史），惟有從國史的演變，於川流不息的長河裡，方有國學（中華文化）可述，九流十家、精彩萬分，正如，唐君毅先生在《與青年談中國文化》諱論所言：「中國文化之精神表現，於倫理道德文學藝術宗教學者，都原有極可貴之處，而且這些精神擴而充之，可作為人類和平，世界新文化之創造基礎」²；也惟有從國史演變中，方有國情可知，十年文革方向錯誤，國家發展倒退，對人民正常生活造成困難，這讓人扼腕，四十年改革開放卻是大好事，綜合國力全面提升，更重要的是，全民小康有望，使人振奮。

改革開放四十年，內地是蓬勃興旺，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發展情況卻讓人惆悵失望。2019 年的政治狂飆，暴力橫生，大學生、中學生乃至小學生「自然」介入，外圍情勢複雜，但對部份熱情激情的眾多「無私」學生而言，認識國情與世情卻愈趨簡單，只要引吭「反送中」，多喊幾聲「支那」，多舉幾次「港獨」旗旌，舉頭三尺就是一片藍天，香港就有很好的未來，複雜事情簡單化，順藤摸瓜，主線就是，大部份學生對國史、國學、國情一知半解，再被網媒、紙媒、社交平台片面的，甚或虛擬製作的資訊強力扭曲引導，中國大、中國惡的嚇人訊息不斷加持，「價值教育連成」，於是，反「警暴」「特區政府」以及「反中國政府」就手就口地湊合在一起，高唱「革命」之歌³；感覺十分美好！

從教育現場看，還是要從 2008 年說起。是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推出《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⁴ 文件，將全港中學各個學科統合成八大領域，一直可以獨立成科的中國歷史科要寄生在「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領域，自此，國史科失去重要的獨立位置，而舊制的、著重培育預科學生中華文化情意教育的「中國文化科」，又因新高中文憑試推出，而壽終正寢。與此同時，新設的新高中文憑中國語文科，取消範文考試，再隨著 2009 年新高中文憑考試全面進入高一課程考試圈，中、英、數及通識科四大核心科目的必修必考，其餘各獨立的、具有獨特學問傳統、更有助國族與文化身份認同的科目，如中國歷史、中國文學等，都不得不退避三舍，至十年已去，香港中學生的國族文化與民族身份認同，如何透過學校教育覓吾土吾民？

一國兩制之香港，一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在實體的地球上，一國必有國史，國民認知國史是應有之義，學校教育是必須要盛載並推行國史教育。這與美國、日本、韓國等相同，並無軒輊！學習本國歷史，可以進入歷史情境、走進歷史人物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去探測歷史的脈動並與歷史人物神遊交往，由此實現國人與國史的永遠融合，薪火相傳，事實上，國人學習本國歷史是以主體一員的身份去感受和體驗，去鍛煉作為一個國人的品格和勇氣，去追尋及承擔作為國人的義務和責任，這樣的學習自然是有意義的。中國人之於中國史，正如美國人之學習美國史一樣，主體不可取代！歷史記憶和歷史體驗是樹立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主要途徑。祖國的認知與愛國愛民族及文化的情感，都只能產生於歷史認識的過程之中，並由此

萌生的愛慕之情。另一逆向，就是民族的衰敗，國家的淪亡，往往由於國族歷史教育的模糊，導致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喪失。此乃龔自珍先生在《古史鈎沉論》的吶喊：「預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⁵！早在英殖年代的1904年，時為香港皇仁書院（前身為香港中央書院）的George Bateson Wright博士，已在工作報告毫不含糊指出：「基於政治考慮，我強烈反對教授中國歷史，因這樣，會把香港變為大陸革命份子的溫床」⁶直至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英殖民政府才開始在中文學校開設歷史科，但分中國部份及世界部份，中國歷史雖然未能完全獨立成科，但約定俗成，香港主流中學的初中階段，多有中國歷史科設立。時間飛逝，九七回歸，一國兩制的香港，焦點在兩制，完全未有正視認識國家的重要陣地，要在中國歷史教育裏啟航的中國歷史裏，要知、情、意、行，一步一腳印的「根」的教育，藉此加強國民身份與價值認同，其時的課程發展處，倒是將通識教育科高高舉起，國史教育低低放下，連初中階段的中國史獨立成科都可打散、切割、合併於其他的學習領域裏去！香港學生的國民「身份」漸漸被剝奪而自知。

幾經波瀾，中國歷史科終於在2018至2019學年起，於全港中學初中階段恢復獨立必修科的地位⁷，但虛弱已久，復甦需時需力，專科師資培訓、授課時間、活動空間當有必要正視，教育局的資源支援，教師的任重道遠，最是關鍵，知易行難。這裡，筆者要提出抗戰時期，已故國學大師錢穆先生主張「真正的中國人就必須學習中國史」和「歷史有助於養成民族的自信心和自信」的觀點。錢氏關於歷史與民族文化關係高屋建瓴的總結是其論述中最為精彩的內容。他指出：「當知無文化便無歷史，無歷史便無民族，無民族便無力量，無力量便無存在。所謂民族爭存，底裡便是一種文化爭存。所謂民族力量，底裡便是一種文化力量。若使我們空喊一個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淵源根柢的文化，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目前的抗戰，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潛力依然旺盛的表現。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責任，卻不盡在於國史知識之推廣與普及，而尤要的則更在與國史知識之提高與加深。」⁸確實，在今天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危機的當下，錢穆先生的說話，是賦予教育局及中小學教師們的重要提醒！

既往不究，來者可追，國民教育就是國族身份與價值認同的教育，毫無疑問，是要往國史教育裡栽種，不張狂、不走捷徑！的確，各學科自有其教學內容，亦會培育批判能力（Critical Thinking），但作為國人學習的國史科，不管左批右判到怎樣無邊無際的境界，花果不管怎樣飄零，最後必會回到落葉歸根處，這是中國歷史科的獨特可貴且不可取代之處。這裡，筆者願意將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於2019年，舉辦之「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活動，作為案例，指出學校教育外，民間社會如何播種「根」的教育種籽。（編者註：活動詳情在此刪減，讀者請瀏覽國史中心網頁）

歷史發展，必有內因外因結合，獅子山下，維港兩岸，東西文化早已薈萃，中華民族血濃於水，東江不會斷流，這裏記錄連香港在內的國史，土壤最是肥沃，言論出版教學都自由。國民教育的根本實源於不黨不私的國史教育，唯有從川流不息的國史長河裏，方有國學深邃文化可知、才能理解國情的大局與小事的發展、明白建國維艱。

國人、國史、國魂，必須結合，抽刀無法斷水，中華民族文化延綿數千年，無需也無法斷、捨、離，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提出「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¹⁴香港，早已回歸中國，但英殖年代崇拜西方文化與價值依然濃重深厚，從國民教育角度看，也就引起著名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早於半世紀前的預言：「以中華文化為主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互結合，將是人類最美好和永恆的文化。人類要想解決21世紀的問題，必須到中國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吸取智慧。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¹⁵這番「過時」的話，香港一些徒具專業之名並影響年青一族的律師、醫師、社工乃至教師，是不曾聽過湯因比「過時」的話語？抑或知而不信？但對當今仍然是最強的美國人來說，卻是相信湯因比預言的，否則，美國不會如此全方位打壓中國，但歷史的發展，很多時候都不以任何強橫、無理的意志而轉移！■

（註：本文原是2020年嶺南學術論壇「家國情懷與文化認同」徵文，編者現略作刪減）

有幾分證據，說幾
分話。有七分證據，不
能說八分話。

胡適



出版團體

教育評議會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2020年10月初版

（版權開放，歡迎複印）

可到以下網址下載本小冊子：



如有意見或建議可電郵：

edconvergence@gmail.com

info@cnhe-hk.org